

#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拉美国际政治的研究

郝永忠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拉美国际政治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 一 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安全问题

墨西哥是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影响最典型的、第一个加入“第一世界俱乐部”的拉美国家。墨西哥自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就遭到来自北方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詹姆士·F·罗歇林所著《重新定义墨西哥安全: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社会、国家和地区》,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一本专著。

关于拉美国家的安全问题,作者从介绍墨西哥安全的概念入手,在几个方面阐述了以墨西哥为典型的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墨西哥安全。(一)墨西哥的经济安全。主要涉及经济差异、工人的变化、环境与安全和移民与安全等问题。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为墨西哥政治、经济与安全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一个舞台,加速了墨西哥经济的跨国重组,侵蚀了在墨西哥稳固了长达60年之久的政治体制。他还讨论了边界与主权观念的变迁等主题。他认为,这些主题与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有关系,而且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墨西哥安全最关键的问题。(二)土著人与墨西哥安全。恰帕斯和墨西哥南部的安全是其焦点。(三)非法经济——毒品贩卖与安全。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代,毒品交易已经成为墨西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反毒“战争”与新自由主义重构、经济萧条、无政府和为此而采取军事化等许多社会现象

相关,这些现象与墨西哥国家和北美地区安全密切相关。(四)民主、人权和墨西哥安全。他认为,“安全”这一法定的概念是建立在国家的民主机构和对人权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溶解国家与社会安全。他分析了墨西哥走向民主结构的缓慢进程,探讨了墨西哥国内社会的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如墨西哥人权、民主和安全三者处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国力量的包围之中。

在安全阶段和概念的界定上,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墨西哥的安全概念发生了巨变。他认为墨西哥的安全分作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墨西哥革命到二战,美国是墨西哥国家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第二阶段是冷战时代,把维护国家的内部秩序作为最主要的国家安全来关注。以上两个阶段,革命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安全概念的基础。第三阶段是后冷战时代,尤其是从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后开始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安全理念发生转变,在安全概念中比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墨西哥官方的声明中,“安全”的概念是暗指社会公正、自由、多元化和威权。但在这个非威权主义的时代,美国对墨西哥内部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

关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把墨西哥作为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个案来研究,体现了把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三个领域交叉性研究的一种尝试。其学术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北美自

James F. Rochlin, *Redefining Mexican "Security": Society, State and Region under NAFTA*, p. 1, p. 126, pp. 3-4

由贸易协定下的墨西哥社会、国家与地区的考察,重新定义了墨西哥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从墨西哥国家内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秩序的三角关系中来探讨,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还探讨了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内部发生的变革。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拉美国家内部政府与私营部门关系的属性。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巩固了国家与商业的战略联盟,而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威胁了脆弱的私人部门新联盟的基础。

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还有:格鲁盖尔和豪著的《跨越北南分水岭的地区主义:国家战略与全球化》、怀斯·卡罗尔编的《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墨西哥与西方霸权》、克拉克·托马斯编著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加勒比的情况》、威廉·A.著的《在后威权时代重新定义墨西哥安全》等。

## 二 世纪之交拉美国家传统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调整

冷战后,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一些拉美学者从国际关系理论和拉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现状出发,试图调整其传统的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譬如,阿根廷就是明显的例子。

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外交政策的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阿根廷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弃了传统的外交政策,退出不结盟运动,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不扩散条约,曾是阿根廷外交部顾问班子主要负责人的埃斯库德提出了“外围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的理论。

拉美传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阿根廷传统的外交政策,是以民族主义、不结盟和对抗美国霸权为主要特征的。而外围现实主义是亲西方的现实外交政策方法,其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与西方联盟,与美国合作和外交上普遍推行实用主义。这一外交战略是阿根廷民主政府所采用有选择的灵活务实外交政策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有些学者还试图突破英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方面的“明显缺陷”,提出一些区别于传统外交政

策的方法,以此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新变化。譬如,外围现实主义学者针对复合依赖学说的主张,指出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全球的相互依赖已经增加的情况并不是真实的。第三世界的权力并没有加强,而恰恰是这些弱小的国家抵制强大的西方国家的侵蚀。

有的学者指出外围现实主义应避免这样的陷阱,即采用发展主义的范式而不顾国家安全,相反把精力集中在由国家间体系所影响的外交政策的牵引力上。而外围现实主义学者却认为自己学说“是外交政策理想的模式,它把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的目的,这种发展既是为了国民的物质财富(那就是说以国民为中心的),也是为了把财富和权力通过商业的联系来积聚国家的实力(那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利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而不是把政治军事实力或安全作为其最高目标的有害的国家中心论)”。

也有的学者指出,外围现实主义更多地是一个外交政策的哲学思想,而非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他们指出,只要外部压力在政治上并不是不可容忍的,那么拉美国家与西方联盟、与美英发展友好关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以及其他相似的政策,或许有助于那些有掠夺本性的上层人士积聚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而忽视人民的境况。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么外围现实主义的十分关键的因素——它的伦理的,以国民为中心的标准就会丧失殆尽。有鉴于此,这些学者认为,不能把外围现实主义作为梅内姆外交政策的基石,而应该把这种学说的作者称为阿根廷一个新的国际学说的“未知先生”。

关于当前拉美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西方学者还提出了诸如“多元外交”战略,“平

Remonda Bensabat, Kleinberg, *Strategic Alliance, State - Business Relations in Mexico under Neo-liberalism and Crisis*,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18, No. 1, January 1999, pp. 71- 87.

Carlos Escude,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127.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 World Affairs, Vol40, No. 1, Spring 1998, p. 8

同, p. 32

同, p. 100

等伙伴”战略以及“美洲二元”学说等观点。对此,国内有些学者已在学术著作中介绍过。<sup>b</sup>在此就不重复了。

关于这方面的著述还有修厄尔·H. 麦哲尔著《点燃安第斯: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可卡因政治》等。

### 三 司法全球化与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

墨西哥的一家报纸曾刊登题为《司法全球化》的文章,认为全球化已经从经济事务扩展到政治和司法决策领域,它必将对拉美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作用。这是在国外学术界反映司法全球化对拉美国家和国际关系造成深远影响的一种典型的观点。

这一观点的由来在于发生过的一个事件。1998年10月17日,英国警察冲进伦敦的一家医院,逮捕了持有外交护照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震惊了智利和全世界。对此,西方学者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皮诺切特是否享有起诉豁免权;从政治学角度看,拘禁进而引渡皮诺切特对脆弱的智利民主政治是好还是坏。对此,西方学者看法不一。

皮诺切特是否被引渡,它对智利乃至拉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将产生何种影响?有的学者认为,逮捕和引渡皮诺切特将“破坏智利国内正义利益与国家稳定间的微妙平衡”<sup>b</sup>，“智利的和平过渡应受到支持而不是破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从独裁和平过渡到民主不是司法问题,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在国内重建和平,使朋友与以前的敌人能和平共存。”<sup>bn</sup>

有的学者认为,这项决定是在距智利6000海里以外的马德里做出的,那里的一名法官以酷刑和屠杀罪起诉83岁的皮诺切特,并要求将其从英国引渡到西班牙。他们指出,智利是惟一受两次结果截然相反的危机打击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债务危机使皮诺切特时期的经济奇迹的泡沫破灭了,后来当经济开始复苏时,民主运动又为最终推动选民于1988年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下台的运动铺平了道路。<sup>b</sup>

就智利来说,作为前国家元首且持有外交护

照的皮诺切特在有邦交的英国被拘禁,意味着国家主权明显地受到侵犯。正如智利总统弗雷所言:“我国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我们不接受在智利犯下的罪却在他国的法院受审。”<sup>b</sup>有的学者认为,对皮诺切特采取的行动造成了民主过渡进程的倒退,使智利社会再次出现至今仍存在的严重分化。

有的学者认为,在从苦难的独裁时期回到民主以后,一个国家如何在司法和宽恕之间找到平衡呢?他们认为智利是无法在这种道德选择题中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家之一。由此,引发了所谓的“威权政体遗孽”(Authoritarian Legacy)和“监护式民主”(Guardian Democracy)的危机,这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无法避免的,只是差异程度的不同而已。<sup>b</sup>他们认为,一个独裁制度的终结一般来说是通过政变或漫长而复杂的政治谈判进程来实现的。智利没有经历过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有的学者提出,司法全球化的新趋势会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吗?他们认为强国可能会谨慎地选择哪些前独裁者应该因其罪行而受到法律制裁。但在缺乏稳固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专制的行为。他们指出,“谁应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掌握国际司法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提出,在将正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同时能够捍卫国家的主权吗?随着皮诺切特的被捕,目前很显然,突破国界正迅速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来规范其体系和游戏的范畴,司法全球化同样需要一定的机制来减少潜在的混乱。”<sup>b</sup>

### 四 经济全球化与拉美国家的新型殖民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拉美国家正面

<sup>b</sup> 肖枫:《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sup>b</sup>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98, p. A 5.

<sup>bn</sup> *A rriagada, Beyond Justice*

<sup>b</sup> 里卡多·拉戈斯·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sup>b</sup>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0, 1998, p. A 8

<sup>b</sup> Mcsherry, J. Patrice, *Incomplete Transition, Military Power and Democracy Argent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11.

<sup>b</sup> 同<sup>b</sup>。

临着这样一个两难问题,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拉美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挑战。那么,随着拉美国家不断融入西方世界,拉美国家是否会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国外有的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拉美国家主权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sup>b</sup> 也有的学者认为,拉美正在美国化,“一些美国的习惯已经逐渐深入到拉美人的骨子里。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国家过感恩节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它发现拉美是一块沃土,可以逐渐渗透到它的社会组织中。”在拉美国家中受美国影响最大的是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由于它们离美国比较近,所以美国很容易进行文化扩张。尽管墨西哥许多年以来竖起了一道民族主义的屏障,但这道屏障正在一步一步地地倒退。近年来墨西哥的依赖性逐渐加强,而美国人的行为也越来越大胆。”<sup>c</sup> 尽管墨西哥仍是穷国,仍是第三世界,但已经搬到了富人区。<sup>b</sup>

有位学者则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谈到,全球化带来了拉美国家的新型殖民化<sup>d</sup>,并认为统治世界的将是跨国公司的联合体,经济实力将取代军事和政治实力。根据大型跨国公司需要,国家的作用将只是第二位的。他谈到,我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的许多小企业是如何消失的。它们被大企业所取代,其中很多是跨国公司。这正是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快,比例越来越大的演变的一部分。他认为,以人治人的新型殖民化,是一种以没有核心权力为特点的世界新形势,这种势力惟一追求的就是效率,而就业或工作条件并不重要。新型殖民化将在那些为它提供政治支持并根据它的需要制定法律的国家中发展,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秩序。这种观点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只有灾难或环境剧变才阻止过进化的发展,就像恐龙的消失就是因为它们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进化。

## 五 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

二战后,美洲国家组织取代泛美联盟,以及《泛美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战后初期美国把泛美体系完全纳入其反共“冷战”政策的轨道,并

以此来规范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在泛美体系内部,拉美国家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与美国坚持的霸权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拉美国家逐渐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泛美体系的危机渐显端倪。80年代,美洲国家组织在泛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上已无足轻重。拉美国家提出把美洲国家组织变为西半球“南北对话的讲坛”。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尤其是与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又有协作。有关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文章在西方学者笔下有较多的论述。

墨西哥是第一个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而且又与美国毗邻相居,因而墨美关系显得非常重要。有的学者提出墨美关系之间的“低强度冲突学说”的观点。<sup>k</sup> 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代言人对于墨美之间的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交易所采取的措施,直接导致墨美边境地区的渐进军事化。他们认真地考察了在外交政策的范式下,尤其是在其低强度冲突学说(LIC)的范畴下的美国国内政策。这种政策在越南战争时期得到发展,它在80年代中美洲地区也有极其有害的效果。这些学者创立了所谓低强度冲突学说的“理想模式”,而且把它的具体操作组成的成分与美国在边境地区关于移民和毒品问题的政策和实践作了比较。

有的学者指出,这种研究方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费力的,但是它最终证明是开阔新的视野的一种有用的方法。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学说的不足之处是过多地把目光放在美国一边,而对“等式另一边的墨西哥缺乏处理”。<sup>l</sup>

有的学者还从历史的角度谈到墨美关系,揭

<sup>b</sup> 《另一个世界的世界》,载阿根廷《号角报》1999年7月11日。

<sup>b</sup> 拉萨罗·法里尼亚斯:《拉美正在美国化》,载美国《新先驱报》1999年1月7日。

<sup>b</sup> 《全球化带来新型殖民化》,载委内瑞拉《宇宙报》1999年2月25日。

<sup>k</sup> Timothy J. Dun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U. S. - Mexico Border, 1978 - 1992: Low - Intensity Conflict Doctrine Comes Home*, University of Austin, 1996

<sup>l</sup>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17, No. 2, 1998, pp. 237- 238

示了“有记录的历史以来墨美关系充满的神秘色彩”。其中涉及从20世纪前10年到50年代的国际关系,而且也涉及墨美移民等敏感的问题,主要是论及了一个贫穷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比它更强大的、更富有的和更赋有侵略性的民族旁边为建立自己的事业而斗争。<sup>m</sup>

美国与巴拉圭的关系。有的学者探讨了巴拉圭政权的变更(即从独裁到民主政权的过渡)以及与美国的关系。这些文章或著作从分析巴拉圭民主化的外部根源出发,阐明美国是如何在那个国家的政权更迭中起作用的。作者还分析了在巴拉圭过渡时期前后由美国所操纵的力量不同形式。<sup>o</sup>

美国与中美洲的关系。美国提出保卫中美洲的安全,以反对共产主义的侵蚀。学者们认为冷战时期在拉丁美洲的小国或易受攻击的国家,比如像巴拉圭这样的小国和中美洲的多米尼加、海地等国,美国在这些地区或国家扮演着对这些独裁政权的生存、发展、衰亡起预测未来角色的作用。美国政府还有一种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忽略的角色,那就是推进和加强在这些国家的民主统治。

有的学者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发起的与中美洲国家政府的军事和警察合作的计划还有助于这些国家监督能力的形成,而在这一时期中美洲国家形成的过程正在完成。危地马拉就是一例。华盛顿的帮助是被“反对共产主义”这一传统的外交思维过程所构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民主理念更优先考虑的就是在这些国家构筑起类似“现代化”和“安全”等专家治国的理念。<sup>o</sup>

除此之外,美国与巴西、阿根廷的关系,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的关系,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马科斯的《种族和国家:美国、南非和巴西比较》、黛博拉·L·诺登的《拉美过去的残骸:军事遗产与美国的影响》、戴维斯·舍尼的《武装的兄弟关系:巴西—美国军事关系(1945~1977)》、哈金斯·马蒂的《政治警察:美国与拉丁美洲》、兰斯福特·W·帕默编著的《在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与加勒比关系的重新定位》、弗兰克·O·莫勒的《从独裁到民主:美国与巴拉圭的政权更迭(1954~1994)》等。

## 六 古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古巴是拉美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为“打破美国封锁,争取生存空间”,古巴的外交活动异常活跃。迄今为止,古巴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它同加勒比和拉美地区国家改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活动,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大力拓展外交方面引起世人关注,成为拉美国际政治的一个显明特点。这一现象在西方学者笔下也多有论及。

古巴与加拿大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谈论较多的一个课题,约翰·柯克和彼得·麦肯纳的《古加关系:另一个睦邻友好政策》就是西方学者第一部研究古加关系的著述。这二位学者描绘了从1959年古巴革命前一直到90年代克雷蒂安总理时期的古加双边关系。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古巴证明是加拿大的一个可靠的和有价值的伙伴,美国应该从古加这种“建设性的参与”和普遍的睦邻友好的范例中学到一些东西,以使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实现关系正常化。简而言之,古加关系是很好地建立起来了。<sup>p</sup>

而另一些学者对此观点评论到,这仅仅是这二位学者在他们著述的分析中的部分成功之处,因为尽管从官方的视野中采撷一个狭隘的外交研究是安全的,但是它缺乏有效性。不管怎样,它对于古加关系的演进缺乏政治和国际背景的深刻理解,而且对于驱使两国外交政策的东西也缺乏评估,尤其在1968年以后,古加关系变得更加复杂。<sup>q</sup> (责任编辑 鲁渝)

<sup>m</sup> Rodriguez O., Jaime E., and Kathryn Vincent, eds. *Myths, Misdeed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he Roots of Conflict in U. S. - Mexican Relations*,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97.

<sup>o</sup> Frank O. Mora,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the US and regime change in Paraguay, 1954-1994*,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7, No. 1, January 1998, pp. 59-75.

<sup>o</sup> Robert H. Holden, *Securing Central America Against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urveillance i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and World Affairs*, Vol 41, No. 1, Spring 1999.

<sup>p</sup> Kirk, John M. and McKenna, *Canada-Cuba Relations: The Other Good Neighbor Polic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97.

<sup>q</sup>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and World Affairs*, Vol 41, No. 1, Spring 1999, pp. 110-111.